

试论俄罗斯寡头的形成及其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启示

肖 龙

(中共清远市委党校, 广东 清远 511520)

[摘要] 俄罗斯激进的产权变革, 转型中国家控制能力的下降和意识形态的混乱, 以及特殊的家庭出身或人生境遇所造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 使俄罗斯社会在转型中形成了一批寡头。寡头的产生使俄罗斯产权结构变革的功效被扭曲, 其对政治生活的深度介入成为俄国政治运行正常化的障碍。中国若要保证制度变迁中社会运行的稳定和有序, 国家控制能力必须要得到适当的加强而不是削弱; 产权变革一定要稳定有序推进; 要注意建设一个全面、有效而灵活的意识形态; 同时政权建设要充分注意开放性和包容性。

[关键词] 寡头; 国家控制能力; 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 D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6-0057-05

一 俄国社会转型中形成的寡头概况及成因简析

此处所用的“俄罗斯社会转型”指的是从戈尔巴乔夫改革起, 至叶利钦连任总统政局相对稳定期间, (苏联) 俄罗斯社会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价值体系等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其时间起讫大致为 1986 年苏共二十七次召开至 1996 年叶利钦再次当选为总统。

(一) 关于寡头

寡头的最初含义是指德性不佳而以财富为基础掌握统治权的少数人。寡头制在古希腊的政治思想中被认为是由贵族制蜕变或堕落而形成的政体, 这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中都有体现。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直至今日, 人们对于在政治生活中基于私利而弄权的少数人仍习惯上称之为“寡头”。

俄罗斯的所谓“寡头”即是指因控制一部分国家管理系统而获利丰厚的大企业集团^{[1]43}。他们也可能借助自身影响而在国家政府机关谋得工作, 但这种工作只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作为俄罗斯著名寡头之一的别列佐夫斯基甚至曾直言不讳地说, 在俄罗斯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就是做政府^[2]。

(二) 俄罗斯寡头兴衰梗概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高度集中、运转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松动, 后来的俄罗斯寡头们大都纷纷抓住这一机会, 创办自己的私营企业, 攫取了第一桶金。

苏联解体后初期, 叶利钦政府对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 社会政治经济急剧转型, 寡头们利用各种体制漏洞, 极尽投机之能, 各寡头实力急剧膨胀。

在叶利钦的第二任期内, 寡头实力进入全盛时期。影响最大的有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维诺格拉多夫、波塔宁、弗里德曼等人。

普京上台后, 为了重塑权力体系, 重建国家权威, 开始限制和打击寡头势力。在 2003 年的“尤科斯事件”后, 以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第一批寡头基本上退出了俄罗斯的政治生活。

(三) 成因简析

1、产权变革为寡头经济实力做大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于 1992 年开始对原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改革。本来所谓激进民主派对公有制或国有制最大的指责就是说它是一种无效率的产权制度。但激进民主派领导政府时期搞大规模私有化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 即是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 不择手段地摧毁原有的产权结构, 建立他们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的产权结构。为此, 他们不惜以行政手段推行大规模私有化, 企业的生产效率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高并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产权结构是不是改变了, 即企业所有者是不是由“公”而转归为“私”。后来的所有寡头都是在这个时期抓住这个机会, 通过与权力的相互借重, 以所谓“私”的姿态堂而皇之的将国有资产攫取到自己手中。

2、转型中国家控制能力的下降, 使寡头有了直接影响政治决策和运行的机会。而在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角逐中,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政治阵营与寡头势力相互借重, 使寡头做大了有了充分的政治保障。

一般来说, 以国家能力为基础的国家控制能力表现为三个基本要素: 第一, 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第二, 国家的法制

化能力,其实质是大众的社会参与问题。第三,国家政治文化的整合能力,即通过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动员人民的能力^[3]。而在转型初期,俄罗斯的国家控制能力在这三个方面的表现都大为弱化:财政能力急剧下降,国家基本支出和基本投资急剧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人民群众普遍出现不满情绪。政治多元化的正常运动缺少法律规范。地方分立和民族分离倾向加剧。而转型初期意识形态的混乱,更使得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等精神因素动员人民的能力大为削弱,意识形态本应具有规范和约束功能基本丧失。

叶利钦政府与寡头集团相互借重的一个代表性案例就是1995年的“贷换股计划”。“贷换股计划”即是叶利钦政府将一批重要企业里的国家股份交由寡头财团来管理以换取贷款。获得资金支持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叶利钦阵营在大选前夕找到了新的强有力的盟友;而寡头们则利用这个机会趁火打劫,既实现了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又为将来找到了可靠的政治庇护。所谓“贷换股”实际就是权力和资本的直接结合。

3、转型期意识形态的混乱,使意识形态无法有效发挥规范和约束作用,从而使寡头对公有财产的侵占掠夺肆无忌惮。

随着苏联时期意识形态体系的土崩瓦解,俄罗斯出现了自由主义、大西洋主义等激进变革思潮。然而在自由化改革遭到严重挫折后,以西化为主旨的自由主义思潮逐步退却。大多数社会成员开始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俄罗斯思想理论界甚至提出了“史学危机”、“哲学贫困”、“精神危机”和“思想的荒芜”等命题。一些报刊舆论惊呼: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4]。1997年叶利钦曾经号召所有的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寻找、创造或设想出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的新的国家思想。《俄罗斯报》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场以寻找国家思想“为俄罗斯的思想”为主题的竞赛活动。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意见成千上万,然而为叶利钦所能接受的所谓“国家思想”却一个也没有找到,以至于叶利钦无可奈何地感叹道,过去,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今天,我们却什么也没有^[5]!对于俄罗斯所存在的思想危机,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他指出:俄罗斯社会在基础性的价值观和方向上缺乏一致意见^[6]。

4、特殊的家庭出身或人生境遇所造就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是寡头形成的主观条件。

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之所以能成为寡头,跟他们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是分不开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使他们能够在社会发生剧变时机敏地做出反应,并能够迅速地抓住每一个“成功”的机会。

而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往往是由其家庭出身、血统或特殊人生的人生境遇造成的。寡头中有些人出生在体制内高层的家庭,比如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他出身于外贸部高级官员家庭。像波塔宁之类的高干子弟能读到可以令一般人进监狱的书籍,他们生活的环境也可以让他们更容易地看到苏联体制的方方面面。他们是最不相信那套空洞乏味

的说教的人们,也是最早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人们。俄罗斯传统上是一个反犹太情绪特别普遍和强烈的社会,而寡头中的多数却都是犹太人,这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别列佐夫斯基、斯摩棱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弗里德曼和古辛斯基。他们大都有过曾因犹太裔的出身而受过不公正待遇的经历。霍多尔科夫斯基从莫斯科门捷列夫学院毕业时尽管成绩优秀,却因为犹太裔背景而不能被分配进重要的单位工作。弗里德曼则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在莫斯科物理工程学院录取中遭受歧视。古辛斯基学的是戏剧导演专业,但在莫斯科剧院却找不到工作;他相信反犹太主义情绪是他找不到工作的真正原因。这些特殊的人生境遇使得他们比一般的年轻人更勤奋,而对苏联社会则更易保持清醒和疏离,保持独立的思考。

二 寡头对俄国制度变迁的影响

所谓制度变迁实际上就是旧制度的湮灭和新制度的建立。当然这个新制度较旧制度应该是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寡头的产生及其发展壮大彻底摧毁了苏联时期的产权结构,就私有化的变革目标而言,这对于俄罗斯的制度变迁是有正面意义的。但若进一步考察,寡头的产生及其发展给俄罗斯的制度变迁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是负面影响。

(一)寡头的产生使俄罗斯产权结构变革的功效被扭曲

本来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在改革之前给了民众一个关于未来的美好期许。他们将建立私有制视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宝。然而,改革开始后,展现在俄国民众面前的图景却是别列佐夫斯基等巨头以每年100亿~200亿美元的规模聚敛钱财,并进而转移到西方银行。与此同时,绝大部分居民陷入生活困苦之中。据统计,1996年俄罗斯人当中约有23%的居民收入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60美元),而占人口比例仅为3%的“新俄罗斯人”月收入超过1万美元。最穷和最富两大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到14倍,绝大多数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文化工作者和科技人员被抛入低收入阶层之中。同时,失业率从1992年的4.7%一直上升,1993年为5.7%,1994年为7.5%,1995年为8.8%,1996年为9.3%。1998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失业率上升到13.3%,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人数从原来占居民总数的20%剧增到54%。千百万人在极端条件下(失业、生病、不幸事件等)失去了起码的生活保障。这种极度两极分化的局面说明,所谓的“私有化”改革不仅没有给俄罗斯带来“效率”,也绝没有给它带来“公平”^[7]。

(二)寡头对政治生活的深度介入成为俄国政治运行正常化的障碍

1、干预政治,使政治运行实效与俄罗斯政治体制改革的所谓民主化初衷大相径庭

第一,直接通过传媒以近乎威胁的口气向其他政治势力施压。1996年4月,俄罗斯几大日报同时刊登了13个“大银行家”致叶利钦与久加诺夫的公开信。13人中包括所有的超级寡头如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斯摩林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他们请求叶利钦与久加诺夫握手言和,以保持国家稳定和政策稳定。公开信威胁对这两人持异

议的其他政治力量:“对那些表现得毫无原则性及和解能力的政客,我们有足够的办法和意志去对付他们。”^{[1]48}

第二,组建寡头同盟直接操纵总统大选。在1995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俄共获得了22.3%的选票,得到了157个代表席位,占450个杜马议席中的1/3强,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96年叶利钦的民调支持率还只有5.4%,形势对叶利钦非常不利。为了帮助叶利钦赢得大选,1996年2月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以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为首的俄罗斯金融工业寡头组成所谓的“达沃斯同盟”。其后,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林斯基、波塔宁、弗里德曼等寡头也加入这一同盟。这些寡头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为叶利钦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并全力配合开展媒体攻势,在俄罗斯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选举游说大战,最终使叶利钦成功连任,演绎了一段在西方观察家看来都不可思议的神话。

第三,直接攫取政府中的重要职位,实现资本与权力的紧密结合。叶利钦竞选成功后,对在大选中作出“贡献”的寡头投桃报李:别列佐夫斯基被委任为权力巨大的处理独联体事务的总统特别代表和地位显赫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副秘书长,波塔宁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其后果是,一方面得到政治庇佑的寡头资本更加肆无忌惮的扩张,19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称,仅六大金融集团就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部分传媒。据西方研究,2003年,俄罗斯的八个股东集团拥有国内64个顶尖私有企业85%的股份,而这64个企业2000年的销售额达620亿美元,占俄GDP的25%。另一方面,寡头可以更加堂而皇之地干预政治运行。从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到普京执政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俄罗斯政府接连换了四届总理,每一届政府组成的台前幕后都少不了寡头们的参与。在莫斯科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政治笑话:“别列佐夫斯基在俄罗斯政府和总统办公厅开了职业介绍所,谁要想进入俄罗斯政府当副总理、部长或到总统府当官,必须要经过别列佐夫斯基的职业介绍所同意才行。”^[8]

2、寡头资本形成全过程的“寻租”行为,造成了严重的腐败

据俄国民意基金会2002年1月31日发表的俄罗斯腐败问题的全景报告称,59%的俄罗斯公民认为,俄罗斯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位居世界前10位,只有5%的人认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根据民意测验,49%的人相信多数政府官员都腐败,只有7%的人认为只有少数官员卷入腐败事件^[9]。

俄罗斯在透明国际组织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的位次印证了民众的这一感受。

表1 俄罗斯清廉指数国际排名(1996—2001)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指数	2.6	2.3	2.4	2.4	2.4	2.3
排名	47	49	76	83	83	81
样本数	54	52	85	99	99	91

注:表中数据出自透明国际相关年份数据

如表所示,自1996年至2001年的六年间俄罗斯的清廉指数排名一直比较靠后。

有学者统计,寡头为了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采用了很多非法手段,与腐败有关的就有通过“私有化”,通过“授权银行”,通过给私有银行、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等十种之多^[11]。

在俄罗斯的暴发户中,约61%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90%私有企业老板是原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原苏联共青团中央机构的干部约有75%~80%在经商,担任各类公司、交易所的负责人^[9]。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透露,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据利西奇金援引政府财政部门提供的数字,从1992年到1996年期间,每年上缴预算的私有化收入仅约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使国家财产遭到的损失还要多^[11]。

严重的腐败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在叶利钦时期,据调查资料显示,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1994年2月为12%,1995年8月为11%,1996年8月为10%,1997年7月为12%,1997年7月民众对议会和总统的信任程度分别为10%和11%^[12]。

三 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启示

所谓寡头或寡头同盟就其实质而言是在俄罗斯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极强“分利”倾向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分利”的行为倾向,在奥尔森看来就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倾向于在不追求社会利益增加的情况下,为其成员在社会总利益中争取更大的份额。即使社会利益重新分配所招致的损失超过该集团由此种重新分配所得利益的许多倍,仍会发生上述情况。在任何集团为其本身争取社会总收入的更大份额时,该集团不会关心此种分配对全社会造成的任何数量的损失^{[13]49-52}。是不是所有的社会组织都有奥尔森所说的“分利”倾向,当然可以探讨。但通过前文的分析,俄罗斯在制度变迁中所形成的寡头具有极强的“分利”行为倾向是毫无疑问的。寡头的存在与发展也的确验证了奥尔森的推论“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社会生活中的分歧加剧。”^{[13]56}中国在制度变迁中会不会生成这种具有极强“分利”行为倾向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的事情。

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毋庸讳言,目前中国既有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现实基础,也确实存在着既得利益集团。而且由于目前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中国进入了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多发期,使其蔓延、层次升级具备了必要的契机。当然,这同时也使中国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遏制进入了关键时期。”^[14]

就如何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学界近些年来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结合前文的分析,笔者只就如何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利”倾向,尝试着做一些比较宏观的思考。

(一)国家控制能力的削弱在客观上为寡头干预政治运行提供了机会,是俄罗斯在制度变迁中出现曲折的重要原

因。中国若要保证制度变迁中社会运行的稳定和有序,国家控制能力必须要得到适当地加强而不是削弱

制度变迁中国家控制能力的加强,表面上营造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局面,其实际功效则在于现代化在可控有序的环境中进行。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与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作为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诺斯就认为,“国家可视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在扩大地理范围时,国家的界限要受其对选民征税权力的限制。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15]21}也即是说,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从现实的经验来看,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论是当年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的建立,还是改革开放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的形式,都是在政府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建立的。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政府依然会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如何加强国家控制能力,建设一个有效能的政府应该是一个贯穿现代化过程始终的重大课题。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论述分析实际上也为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控制能力的加强做了正面注解。他认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而欲在这个时期根除政治动荡和衰朽,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是必需的。

普京上台后施政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即是加强国家控制能力。这在就任之初,其对《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中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他指出俄罗斯不应该也不会成为警察国家,俄罗斯必须建设一个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权。否则它就不是政权而是对人民的嘲弄^{[16]95}。而随着普京对寡头势力的打击以及对国家权威的重建,俄罗斯经济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逐渐出现了有些学者称谓的“普京中兴”。所谓“普京中兴”实际上为制度变迁中国家控制能力的加强做了一个经验上的正面论证。

(二) 产权变革一定要稳定有序推进

产权结构的相对稳定是社会产出的基础。在新的产权结构(即使这种新的产权制度是更有效率的)建立前就彻底摧毁原有产权制度,只能带来社会总产出的锐减。而俄罗斯激进民主派领导政府时期搞大规模私有化不择手段地摧毁原有的产权结构,建立他们所宣扬的资本主义的产权结构。结果却是寡头集团趁机“分利”,造成了社会极度两极分化、社会产出锐减的局面。而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一直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保证了社会产出和利益分配格局的相对稳定;而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结构较之原来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产权结构确实更有效率。这种渐进的产权变革保证了中国30年社会产出的稳定增长。中国在未来仍会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国家应该在这个过程中保护各种产权形式平等竞争,同时注意保护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避免国有资产遭遇“分利”行为而流失。

(三) 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制度变迁的稳步进行,建设一个全面、有效而灵活的意识形态是必不可少的

如前文所述,转型中的俄罗斯出现意识形态混乱或精神危机是寡头对公有财产肆无忌惮的侵掠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意识形态建设是国家政治文化整合能力的重要内容,它对制度变迁有着特殊重要的约束作用。普京在就任代总统前夕,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1999年《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里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行的。”^{[16]7}为此,他呼吁要用以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社会团结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新思想将民众团结起来。尽管他颇费苦心地将俄罗斯新思想与所谓“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但实际上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俄罗斯新思想都是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

新制度主义对于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有着独到的分析。诺斯认为“个人效用函数远比新古典理论迄今为止体现的简单假定复杂。”^{[15]50}他观察到,当收益超过成本时,有人违反社会规则,但同时也有人仍在遵守社会规则。

这种个人选择的不同主要就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造成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使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可能有不同的成本—收益函数,从而影响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意识形态资本较多的人往往会自觉遵守社会规则,机会主义和搭便车现象较少在他们身上发生。从这个意义讲,诺斯认为意识形态是寻求社会稳定性的灵丹妙药。同时,他认为意识形态还是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它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

因而建设一种全面的灵活的意识形态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全面的,指的是该意识形态既能说明现有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如何成为更大的体制的组成部分,又能说明其与过去情况的吻合。所谓灵活的,指的是该意识形态能够随着经验的变化而调整自己,去发展一套与经验更加相符的观念。立足于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能够很好地符合全面性和灵活性这两个标准。尤其是灵活性,诺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做得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好得多。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目前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处于指导地位。这对于我们的制度变迁应该是种优势。我们在进行意识形态建设时应注意继承和发挥这种优势。

(四) 政权建设要充分注意开放性和包容性

与开放性与包容性相反,就是权力的封闭和垄断。封闭和垄断的权力必然会造成两个群体,一是垄断权力的特权群体;另一则是被排斥在体制外受歧视的群体。这两类群体都不会为特定体制的存在提供合法性支持。

被排斥在体制外,只会培养出对现行体制的仇恨。这种

排斥的最终后果只能是培养出现行体制的掘墓人。犹太裔寡头之所以联手来将原有的产权制度彻底埋葬,除了本身逐利的原因外,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由于长期饱受歧视,他们对于原来的体制是没有什么感情可言的。即使是特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也未必会忠诚于原体制。因为特权是显然违背人们现时所达致的公平正义原则的,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个体易于在社会生活中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当原有体制能有助于其利益实现时,他会维护原体制的存在;当该体制阻碍了其不当利益实现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该体制的反对派阵营。在俄罗斯制度变迁中,这类个体的典型就是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之类的高干子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社会阶层。如何处理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问题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一次重大考验。利普赛特认为,即使一种政治制度具有合理的有效性(最主要的是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如果在关键时期新兴社会群体被剥夺参与政治的机会,该制度的合法性仍将成为问题^[17]。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章,从制度上允许发展新兴社会阶层先进分子入党实在是加强其执政合法性的英明举措。

[参考文献]

- [1] 郑羽. 普京时代[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2] 薛福岐. 俄罗斯寡头——尤科斯之后谁会是下一个末日来临[J]. 金秋,2004(14):12-14.
 [3] 关海庭. 中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28.
 [4] 张树华. 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M]. 北京:新华出版

- 社,2001:294.
 [5] 汪宁. 普京的俄罗斯思想[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3.
 [6]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 俄罗斯向何处去[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344.
 [7] 孔令栋. 产权变革和寡头垄断——对俄罗斯私有化的政治分析[J]. 东欧中亚研究,2000(5):29-35.
 [8] 李建民. 谁在主宰俄罗斯——俄罗斯的寡头与政权[J]. 世界知识,2003(19):8-12.
 [9] 戴隆斌. 俄罗斯腐败的特点及其原因[J]. 社会主义研究,2007(2):20-24.
 [10] 解建群. 腐败的一般规律与俄罗斯腐败的特殊性[J]. 国外理论动态,2002(2):35-38.
 [11] 王金存. 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反刍[J]. 东欧中亚研究,1999(1):32-34.
 [12] 戴隆斌. 俄罗斯的腐败及其后果评析[J]. 俄罗斯研究,2007(3):25-27.
 [13] [美]曼库尔·奥尔森. 国家兴衰探源[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4] 刘彦昌. 聚焦中国既得利益集团[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129-130.
 [15] [美]道格拉斯·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上海:三联书店,1991.
 [16] [俄]普京. 普京文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7] [美]利普赛特. 政治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6.

Formation of the Russian Oligarch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ystem

XIAO Long

(Qingyuan Municipal CPC Party School, Qingyuan 511520, China)

Abstract: Russian radical property right reform, the decreasing controlling ability of the state under transformation, the confusion of the ideology, as well as the unique way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style from the special family background or life situation make the society in Russian form a batch of oligarchs. The existence of Russian oligarchs makes the effect of property right structure reform distorted, whose deep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life has become the obstacles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the Russian political operation. If China wants to ensure its system transition stably and orderly in social operation, the controlling ability of the state has to be strengthened appropriately but not weakened; Property right reform must be advanced stably and orderly; and the part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effective and flexible ideology;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has to pay full attention to its openness and tolerance at the time.

Key words: oligarchs; the controlling ability of the state; the theory of new system